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学科前沿扫描 | |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研究 >> 视野领域 >> 正文

今天是： 2009年12月8日 星期二

何晓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上）

热

何晓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上）

[作者：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 转贴自：《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点击数：158 文章录入：teadmin]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文化史；学术史

[摘要] 3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由“文化”的定义发端，然后推及文化史的范畴、学科范围、研究对象、方法论特点等方面，以“专史说”和“范式说”较有影响。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史基本特质、基本规律的探析，主要通过文化通史类著作及通论性文章体现出来。呈现中国文化纷繁鲜活的生命样态，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就所在。划分区域研究、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是这方面探索的几种主要形式。中国文化史研究经历了辛苦探索之路，其间尤其具活力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民间文化史”研究的潜沉推进。最大缺憾是少见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专家之作。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博采异国之长，更应该注重从丰厚的中国传统史学中去吸取理论营养。

[中国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5—0019—10

An Overview of the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Xiao-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Cultures in China,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s; overview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a has witnessed a fantastic spurt in studie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of culture which have yielded bountiful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history of culture firstly focus on definitions of "culture", then on domain of history of culture, scope of the disciplin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among which "studies of history of particular subjects" and "studies of historical paradigm"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author here argues that history of culture does not focus on history it- self, rather on "history in light of cultur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re have been rich researches into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s, bringing about quite a large amount of works and papers on studies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are the versatile expressions of Chinese cultures. Regional research, dynasty research or particular subject research are the major forms of research. After undergoing unsettling "cold" and "hot" times,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s still on its way with the thriving development in "history of social culture" and "history of folk cultu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distinct and unique researches are still in short. Hence,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rich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as well as from foreign studies.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洪波涌起。学术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的荒谬与罪孽进行理论清算和历史剖析。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勃然而兴,并在其后十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史研究的“热度”明显降低,但泡沫散去,潜沉的学人依旧执著。文化史研究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需求下,继续自己的逻辑进程。尽管有学者批评“社会史鸡零狗碎,文化史云山雾罩”,但是近30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有目共睹的进展,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向着更加深入、广阔的领域拓进,则是没有疑问的。

本文拟对30年来的文化史研究概况作一勾勒与评述。①不当之处,敬祈博雅君子教正。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领导中华民族将思路与行动从虚妄的政治迷狂中扭转到与人类文明的大路向相一致的轨道上来。学者庞朴论道:“‘文革’一结束,邓小平宣布不搞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带来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促使知识分子开始考虑一些问题,是不是仅仅有四个现代化就可以了?很自然,许多人就提出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问题,于是保持了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这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②学界普遍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还应该政治的现代化,或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工业、农业、科学、国防的现代化?”③1978年到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稍后湖北大学历史系也成立了明清文化史研究室。这些机构虽然专职研究人员不多,但他们的出现预示了文化史研究的生机初现。198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呼吁开展文化史研究,以填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巨大空白”。会议还决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④198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积极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并初步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⑤用朱维铮的话说,即“中国文化史,在度过多年的向隅生活之后,最近又被提上了学术界的日程”⑥。

1986年1月,由复旦大学主办、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组委会主任委员的首届国际中国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阵容堪称“豪华”,国内80、90年代最活跃的一批学人几乎尽在其中。讨论会高屋建瓴,就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阶段、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今天来省视当时的各方观点深刻、精当与否,当然不宜多发溢美之辞,但是从积极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客观历史作用来说,会议功不可没。尤其是与会学者就促进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和设想(如怎样保持和推进良好的研究势头,怎样开拓文化研究的视野,怎样深观文化传统的结构,怎样寻求特异文化的历史模式,怎样发展目标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学派)⑦,为其后相当一个时期的研究打开了明晰思路,奠定了基本格局。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讨,一般均由“文化”的定义发端,然后推及文化史的范畴、学科范围、研究对象、方法论特点,等等。由于“文化”的内涵过于模糊,且人言言殊,自说白话的情形时有发生,因而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史难以确定边界和规范。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正是含义难定、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在为学者广泛接受的同时,活跃了历史思维,有力地带动了史学研究的观念变革。这一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史研究预示着、体现着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必然

①本文以中国大陆学人的研究成果为讨论范围,不涉及海外华人及港、澳、台学界的成果。另外,出于篇幅的考虑,对考古文化、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也不涉及。特别要说明的是,尽管这样限定了范围,但30年间有关成果的数量还是大得惊人。以个人之力,实在难以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因此,只能是在笔者目力所及、识力所限的前提下,勉为管中窥豹之能事。挂一漏万,尚属小疵;开罪方家,是为大憾。其间的无奈与苦衷,还望同仁海谅。

②见王元化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0

页。

③汤一介语，见《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97页。

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至1987年间共出五辑，在推动文化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

⑤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数十种，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和《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年)，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张正明的《楚文化史》(1987年)等等。“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出书数量不多，但质量均属上乘。特别是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年)、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1986年)，更是文化史研究的难得佳作。

⑥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⑦详见邹振环等记录整理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⑧见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性和必要性。因而，文化史研究事实上构成了新时期史学变革与发展的一个生长点”

①。

因为对“文化”的理解众说纷纭，学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解也是各抒己见。向仍旦强调，“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性的“文化”，应属于社会发展史或通史的研究对象；而狭义性的“文化”，“即诸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各种制度的纽结点，才是文化史所要研究的对象”。②吴廷嘉、沈大德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由其个体和群体共同创造并经社会认知的行为方式、组织建构和道德规范，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和技术、艺术成果。”他们批评人们对文化史的“误解”：“往往顾名思义地以为，文化史就是研究人类文化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作用机制的学科。实际上，这是文化人类学的内容。文化人类学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构架和一般方法，它同文化史的区别，有如社会发展史同历史研究的区别。”他们提出文化史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研究特殊而不研究一般；其二，侧重于主体活动特点比较鲜明的领域；其三，离不开价值评判。此外，文化史研究“现实感比较强，这也是研究者千万不可忽视的一点”。③长期以来，见诸各种著作、论文的文化史定义不计其数。大致划分，较为普遍的当数“专史说”和“范式说”。“专史说”力图从研究对象上将其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思想史、哲学史等区分开来(有人将其称为“切蛋糕”式)。这一派学者中的大部分强调文化史的综合特征，主要是从综合与分析的差别方面区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思想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的不同。“范式说”则显然源于库恩。问题是库恩所谓的范式是在科学的范围内以一种研究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任何一种范式都有被另一种范式取代的可能性。从文化史学的发生、发展来看，它并不是作为取代其他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范式而出现，也不会被其他的史学范式所取代。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文化史并不是一个范围或内容的问题”④。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史是一种“研究策略”。“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⑤笔者以为：“如果企图仅仅在研究对象范围的划分上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哲学史直至科学史、工艺史等清晰地区分开来，不仅意义不大，而且根本就做不到。”⑥直言之，“文化史”就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所看到的历史。至于什么是“历史的眼光”，则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过程；其二，人类使自己不断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区别于动物，从“自然人”向“文化人”进化的过程。站在这样的观察点上，观照人类历史，得到的景象，就是“文化史”。过去许多文化史研究者不是不承认“大文化”，而是在承认它以后，紧接着就把自己的视野缩到“小文化”(通常说的精神文化，或者观念文化)的域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作茧自缚。⑦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史，不是客观事实对象意义上的“文化的历史”，而是主观理解意义上的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所看到的历史”。在这里，“看”者的选择，无疑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他决定了往哪里看，看什么，怎样看，以及如何评价看到的内容。简言之，确定文化史研究“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研究什么”，而是“为何研究”和“如何研究”。

①江湄：《“文化热”、“文化史”与当代史学的观念变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②向仍旦：《中国古代文化史刍议》，《文史哲》1984年第4期。

③吴廷嘉、沈大德：《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特征》，《人文杂志》1987年第5期。

④刘伟：《当代西方史学转向文化史的最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⑤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⑥何晓明：《仁山智水时时新》，《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⑦何晓明、王艳勤：《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着手方法，蔡尚思有很通达的看法和很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他认为文化通史应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和基础，应把文史哲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由文入史哲以及其他”。文化通史应突出各时代的突出领域和突出问题，不在这些范围内的可从略和少说。如果觉得文化史实在太广泛、太笼统，那就首先研究和写出文学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典章制度史等部分。“要之，能合则合，合是最上；不能合则分，总以不致挂一漏万为好。”对于资料的掌握，只能做到比较全面，“要有差别的读书，不要无差别的读书；要有限的读书，不要无限的读书”。①朱维铮则强调，以整体为考察对象的中国文化史，至少有以下四点要求：一是要求我们发现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规律；二是要求我们一经发现支配性的规律，就必须详密研究它在历史过程中的诸般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三是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决不能从观念到观念，使文化史变成观念形态的自我发展史；四是要求我们对于文化史的一般规律，也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②蔡尚思和朱维铮都没有从“文化”概念入手去绕圈子，而是直接抓住文化史研究的特色、核心和关键，简单明了地从方法论上立住脚。高屋建瓴的气度，脚踏实地的做法，值得学人三思。

二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史基本特质、基本规律的探析，主要是通过文化通史类著作及通论性文章体现出来。

1986年，冯天瑜、周积明合著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灵动的思路、新锐的观点以及活泼的文风深深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问世的文化通史类著作。它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从地理背景(区别于开放性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区别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和社会结构(区别于古代希腊、罗马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封建领主制以及印度种性制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三方面剖析了中国文化生态③，并以清新流畅的笔法，勾勒了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中国文化蜿蜒多姿、历久弥新的历史进程。其不足则是未能提出与一般通史相区别的中国文化史的阶段性分期。几年后，冯天瑜在另一篇专论中作了补正。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1. 前文明期：智人到禹传子；2. 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3. 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4. 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5. 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清中叶；6. 中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清中叶迄今。④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分期，较有特点的还有胡凡等提出的“五期说”：1. 酝酿成型期：从远古到周公制礼作乐；2. 梳理完备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 发展高潮期：从汉武帝到南宋理学形成；4. 高度成熟的发展与裂变期：元、明到鸦片战争前；5. 冲击转型期：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当代。⑤

1999年，《中华文化通志》问世。这部3600万字的煌煌大著，分历代文化沿革典(李学勤主编)、地域文化典(方可主编)、民族文化典(王尧主编)、制度文化典(刘泽华主编)、教化与礼仪典(孙长江主编)、学术典(庞朴主编)、科学技术典(陈美东主编)、艺文典(刘梦溪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汤一介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典(姜义华主编)等十典，每典十志。各典主编，皆极一时之选。200位专家穷8年之功，共襄此盛举。以志书的形式展示中国文化的流变，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扬。⑥就此而论，《中华文化通志》堪称文化史研究领域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典范。

在文化通史的修撰方面,北京大学国学院组织36位文、史、哲、考古学科的教授,用五年时间撰写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⑦堪称精美之作。全书将总体性和标志性结合起来,分中国文化为

①蔡尚思:《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1期。

②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研究散论》,《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④见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

⑤胡凡、马毅:《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管窥》,《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

⑥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门类。司马迁以后,“志”一直是中国史学著作特有的形式之一。

⑦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文明史与文化史的关系,学界多有讨论辨析。因篇幅原因,本文不拟就此展开。笔者以为,《中华文明史》叙述的内容与本文所论中国文化史研究完全一致,故在此论列。

四期、八个阶段。第一期:先秦,含先夏和夏商周两段;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含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两段;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含隋唐五代和宋元至明中叶两段;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含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两段。^①在资料的翔实精审、论断的公允平实乃至语言的锤炼、图片的选择方面,《中华文明史》都力求完善。“本书有别于普及读物,既不是各方面文化知识的简单罗列和介绍,也不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一般性叙述。我们在吸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理论、观点、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尤致力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系统论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展示各个时期文明的丰富多彩的面貌,着重阐述各个时期文明的亮点、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尽可能揭示文明的发展规律。”全书《后记》的以上“夫子自道”,可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

关于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的归纳提炼,是通史类中国文化史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前述《中华文明史》的总绪论提出:“一种绵延不断的古老文明,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它将中国文化的特质概括为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和整体思维。^②相关论著中类似各种提法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岱年的观点。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四种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③这一观点在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④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述。在笔者所见数十种“概论”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张、方两位主编的这一种无疑是上乘之作。它关于中国文化特点的梳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关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的归纳(民族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价值整合功能),都体现了高度浓缩的学术含量和高度概括的理论驾驭能力。当然,作为一部面向所有文理科大学生的教材,该书的内容过于宽泛,是其遗憾。如能考虑到课程学时及学生知识基础方面的限制,加以适当裁剪,“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对于莘莘学子,将是莫大福音。

①《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至第18页。

②《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6~11页。

③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④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于2004年又出了修订版。

● 上一篇文章: 郝时远: 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下)

● 下一篇文章: 何晓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下)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青年汉学家…[100]
- 美报: 中国崛起, 美国人很焦虑…[98]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81]

相关文章

- 何晓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174]

- 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287]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87]
- 新科学家杂志：中国人挑战“非…[112]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